

□韦钦国 常辉

周馥(1837年-1921年),字玉山,号兰溪,安徽至德人,富有爱国情怀,支持洋务运动,与四子周学熙、五子周学渊一起对山东文教事业做出了贡献。

周馥与山东产生交集始于光绪十年(1884年)。此年夏天,因中法战争山东等沿海防务吃紧,李鸿章奏请周馥负责渤海湾海口一带防务。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经山东大清河入海后“无岁不决,无岁不决数……河患日深,民生日蹙。”因周馥熟谙工程,善治河患,并曾任永定河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李鸿章电招周馥“赴山东襄黄河工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7月到任),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离任,在任期间颇有政声。

在文教方面,周馥支持礼贤书院——礼贤书院系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青岛开办的一所学校,主要招收中国学生。周馥任巡抚当年12月5日即到青岛,《胶澳志》载“是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他利用这次青岛之行视察了礼贤书院,对新式教育给予认可,允许该校学生参加刚创办的山东大学堂“优贡”选拔考试。20世纪初期,周馥携家居青岛时,其长子周学海的三子周暹(字叔弢)曾在礼贤书院就读。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始,周馥等一批逊清王公贵族、高官大吏避乱青岛。经周馥介绍,同治十三年(1874年)状元、大学士、两朝帝师陆润庠,学部侍郎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等认识了卫礼贤,卫礼贤聘陆润庠等为礼贤书院中学教员,聘劳乃宣为监督(校长),该校除开办工科、德语外还从事中德典籍翻译等文化工作。

1911年,卫礼贤在礼贤书院东花园“与中国寓岛诸同仁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尊孔文社”主要宣扬儒、道文化,其成立亦得益于周馥帮助,正是他推荐劳乃宣到青岛主持尊孔文社事宜。在尊孔文社,《论语》《老子》《易经》等经典“暨译西文,流传西国”,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通过尊孔文社传播到国内。尊孔文社还“由寓青的中国学者和德华大学德国教师轮流演讲”,以讲座方式推进中德文化交流。

1914年,在周馥等支持下,卫礼贤和“中国寓岛诸同仁”在尊孔文社西侧建起藏书楼(图书馆),“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德文”(卫礼贤《中国心灵》)。恭亲王溥伟题写匾额,劳乃宣撰写《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藏书楼广收经史子集和诸子百家珍贵书籍,藏有中文图书6000册、德文3000册、英法等3000册,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之一。



当时,卫礼贤正“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志译介中国古典著作”,但“难以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中国精神的真髓”,“译介工作障碍重重,难以为继”。周馥向卫礼贤推荐劳乃宣等“真正的中国学者”,这些学者乃前清高官,多举人、进士出身,通经典,谙国学,由他们向卫礼贤解读《论语》《易经》《道德经》等经典,指导其准确释意和翻译,这才使卫礼贤能够在“理解确切而透彻”的基础上,成功翻译了《易经》《论语》《诗经》《吕氏春秋》《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经典——《易经》是卫礼贤成为汉学家的标志性著作,影响深远。

劳乃宣回忆,“尉君自以《孟子》翻德文,每日来弟寓,由弟讲授一小时,归而笔译。又以德

国哲学家康德所著之书译中文,由尉君与周玉翁(周馥)之孙叔弢同译,而弟为之修饬而润色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连卫礼贤自己也认为《易经》“恐怕永远也不会完工。”

周馥育有六子,除三子周学涵早夭外,其余皆入仕并有所成。其中,老四周学熙、老五周学渊两兄弟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校长,推动了20世纪初山东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和学科发展。

周学熙(1866年—1947年),字缉之,别号止庵,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实业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由蓬莱知县李于锴先行筹备,获准后学堂选址济南泺源书院,山东大学堂成为京城外首座官办的高等学校,也是现在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

初时,袁世凯委派幕僚唐绍仪为管理总办(校长),开学不久唐绍仪即调离,周学熙接任总办,因唐绍仪在任时间很短,就产生了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到底是唐绍仪还是周学熙的争论。事实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初六(阳历11月16日),山东大学堂获准开办,唐绍仪、周学熙、方燕年三人先后在该年底到校,周学熙离任后由候补道方燕年接任,三人在任时间都不长。

周学熙担任山东大学堂总办并非偶然。他16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官立山东大学堂创办时他正在济南当差,身份是山东候补道、巡抚袁世凯的幕僚,此前曾任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总办,算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受其父亲周馥洋务思想影响,加上创办实业的经历,周学熙思想开放,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订章程、肃校风。一方面,编印《中学正宗》,选四书五经为“中学根本”;一方面,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主持编辑《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洋各家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的知识。”(据山东大学官网)这种理念在百年前是开放且富有创新意义的,对其他省份大学堂的开办也提供了有益借鉴。

周学熙实际担任总办时间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月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半年,约半年时间,其辞任总办并非主观意愿,而基于清朝官员任职的“亲属回避”制度——有直接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官员,不能在同一衙门或具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中担任职务,以免官官相护或直接利益输送,一般是下位避上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后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周馥接替袁世凯的职位升任山东巡抚,周馥任巡抚其子周学熙要遵例“回避”。周馥实际到任时间是当年七月,在此之前一个月左右周学熙就被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圆局”调离,总办一职由方燕年接任。

老五周学渊(1878年-1953年),字立之,教育家,1901年7月随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后任山东候补道。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大学堂更名山东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末周学渊接替陈庆和任总监督,成为第八任校长,时间大约为一年,后任山东调查局总办等职。

周氏父子为山东文教事业所做的努力不止于此,山东师范大学的创办也与他们有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0月,上任两个月的周馥就在山东大学堂增设师范馆,校址选在供乡试的贡院,拨库银一万两作为开办经费。次年9月,师范馆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命名山东全省师范学堂,这就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最初由来,山东师范大学官网对这段历史有专门介绍。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周馥支持下,山东大学堂在济南杆石桥路北购地140多亩,修建校舍、操场,冬季迁入此后更名山东高等学堂,监督(校长)陈恩焘。

令人称道的是,周馥上任伊始便派出张树元、曲同丰等10人,以北洋官费留学生的身份进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天,由方燕年带领选派的55人赴日本弘文书院学习,开创了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先例。山东大学堂初办时,山东大学官网介绍,“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周馥认为“山东延请洋务各教习,皆不过‘略通一艺’,以致‘风气未能大开,学生鲜有进步。’”1904年9月离任巡抚前夕上书清廷,“特拟派大学堂学生十二名赴日学习,以备教习之选。”这些留学生为培养人才、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后来,周馥还参与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安徽公学的创办,周学熙还创办了北洋工艺学堂(河北工业大学)。

周氏父子三人在青岛也有交集。周馥到青岛后周学熙、周学渊兄弟相继来青岛侍养,父子联手开办华新纱厂(纺织厂),周暹参与协办,华新纱厂成为青岛最大的民族企业(青岛国棉九厂)前身。周馥还推动了济南、周村、潍县自开商埠,对山东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周氏父子对近代山东文教、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2021年山东大学将迎来120岁生日,周氏父子为推动齐鲁文脉繁衍所做的努力值得后人铭记,周学熙、周学渊兄弟先后担任山东大学校长的这段特殊经历更令人津津乐道。



【行走齐鲁】

威海历史看栖霞街

□陶遵臣

甲午海战后威海成为英租借地,其间建立爱德华商埠区,为栖霞街繁华鼎盛时期,游艺社、茶社、戏院、医院等分布其间,系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繁华商业街。威海栖霞街承载着威海的兴衰荣辱,传承着威海的文化发展,因此有“甲午海战看刘公岛,威海历史看栖霞街”的说法。

说起栖霞街的由来,就不得不说威海屈辱的历史。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占领威海湾。1898年,英国在控制了香港及长江流域的同时,暗中同占领威海卫3年之久的日本政府签订条约,以代替中国支付战争赔款为借口,把铁甲战船开进威海湾。开始,英国政府只是把威海卫作为远东水兵避暑之地,由英国海军部管理。

由于当时的威海卫只是一座小城,所以,英国人决定将开发的重点设在威海卫东城墙外侧与东海岸之间的地区,将之命名为爱德华商埠区,分三大区域实施开发。先期开发城东北部的东码头区和行政区,建成官邸和兵营,开办学校、医院和民宅,形成商埠中心,就是如今的海港码头往东北到黄泥沟村一带;接着向南开发体育区,利用老城与东海之间开阔平地,就是如今的昆明路和宝泉路之间的地带,建成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运动场,称之为大操场,在中国开了足球运动的先河;再往南就是以现如今的栖霞街为中心的文化娱乐中心,这个区域是当时商埠区中最热闹的商业区,呈现出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至1930年,威海卫收回时这里已初具规模,中外商号聚集了700多家。1931年这里命名为栖霞街、清华里、绥远街、青云巷、建平街等,1967年统称红卫街,1987年7月恢复为栖霞街,从此这里就成为威海著名的老街栖霞街了。

栖霞街街名的由来,如今已无从查考,但是,据说凡以“栖霞”为名的街区,过去大都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繁华去处。威海的栖霞街曾是当时英租界的娱乐中心:有妓院、剧院、茶社、商社和医院,是典型的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成为这一时期威海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

当时的栖霞街是一个杂色斑驳的地方,贩夫走卒、车夫卖匠、乡下财主,豪商富贾、买办官吏、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潮水般往这边涌,街上总是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市声如沸;店里总是顾客盈门,嘈杂喧嚣,业务繁忙;空气里总是充斥着美酒佳肴的香味和脂粉味,加之大车店、马掌铺里的马粪味儿和人身上的汗味儿……是威海当时空前繁华之所在,无论是谁一旦在这里碰面一律以“爷”相称。

1918年,威海商人阮长生首先在栖霞街投资兴建同乐戏院,成为威海第一个营业性的现代剧院。后来,天津商人韩德兴投资在清华里开办“华乐茶园”小舞台,每天有“花宝珠”“花宝金”“花宝银”等十几位女歌手登台卖艺。每位女歌手都有自己的折子,客人想听谁的歌就拿谁的折子点歌。歌手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挂在舞台前面,谁唱一个就在谁的名字下画一个圈。客人想捧谁就多点谁的货,多给谁划圈。小舞台有一天最多演6场。

当时的戏园子是栖霞街的标志性建筑,城里城外的人们纷纷到此听戏娱乐。最大的同乐戏院,分上下两层,可容纳一千多人。1928年,已经更名为民兴舞台的同乐戏院,曾放映过威海首部无声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栖霞街已不再只是城外的商业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威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轻工厂、橡胶厂、书店、钟表厂,都围着栖霞街建立。物资局、农业局、水产局等重要的机关单位也设在栖霞街,很多领导干部也居住在栖霞街的公管房里。1974年,栖霞街的北侧盖起了四层的百货大楼。之后的短短几年,楼房相继出现,服装厂、市委大楼先后建成,西侧也有了居民楼。

改革开放后,威海迅速崛起,而有着八十年历史的栖霞街却日渐失色。栖霞街内的剧团撤销了,戏院拆除了,甚至为了盖楼、铺路,部分民居也被拆除,栖霞街很快地变成了纯粹的居民区。

2020年8月,栖霞街改造方案出炉。规划显示,栖霞街地段拟规划调整为商业、商务用地,作为市区仅存的百年老街,将华丽转身为威海市中心新地标。

投稿邮箱:
qlwbrwql@163.com